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评述

朱 庆葆（南京大学）

乡村建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知识精英所领导，以复兴农村为宗旨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在近代颇为引人注目的一场社会改革，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并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审视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对于研究农村、改变当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无疑具有极强的历史借鉴意义。我国学界曾就其给予深入观察和研究。本文即试图对20世纪学界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作一评述。

（一）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研究概况

“乡村建设”一词最初见于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一文。¹民国30年代随着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²乡村建设一词³也广泛出现于当时的书籍报刊之中，但关于乡村建设的含义所指却并不完全相同。梁漱溟的看法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是乡村自救运动”，“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⁴尽管梁氏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在当时影响甚大，但他关于乡村建设的表述恐怕很难用以描述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地域背景的差异，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广主体差别很大，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教会组织，既有高等学校，又有社会团体，这导致了各地乡村建设模式的极大差异性。因此，很难给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下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它在很大意义上只是一个统称。⁵

在这里，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危机的反应，是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多种机构和团体出于不同动机，在多个地域开展

1 据梁漱溟晚年自述，“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参见郑大华编：《梁漱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发行处1934年版，第1页。

3 乡村建设在当时有很多意义相近的词语，比如“乡村改进”、“农村复兴”、“农村改进”，尤以“农村改进”一词的应用相对广泛，且其含义与乡村建设大抵相近。沈光烈曾作如下解释，“农村改进是就一农村或若干农村划成一适当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的方法技能以化导训练本区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参见沈光烈：《农村改进的实施》，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3页。尽管各地模式不尽相同，但大致而言，皆可归入乡村建设一类。

4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9页。

5 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虽以全国范围为讨论对象，但他也没有给乡村建设运动下一个明确定义，只是在乡村建设这一术语下将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联结在一起，且该书的讨论重点是定县和邹平两大实验区。其他论著都是以某一地区为探讨对象，因而也很少涉及。

的一场模式多样的乡村变革。尽管他们动机不同，模式多样，各个实验区之间有不同的差异，但都强调对于乡村社会的建设一面，所注重的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共性。

或许是太靠近时代的缘故，民国时期这场运动的意义还没有完全彰显。因此尽管民国年间关于如何建设乡村的对策性研究比比皆是，但关于这场运动本身的研究却乏善可陈。略可提及的是两本编年史性质的著作，一为孔雪雄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一为许莹涟等人所编的《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⁶。实际上，即便是这两部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着眼点仍是如何来建设破产的乡村。如孔雪雄在其书开篇即讲到，“本书叙陈近今国内比较有理想有计划的几处农村工作，一面所以指明近今国内农村运动之趋势，一面亦便是为想供给有志农村运动者的参考之一助”。⁷观其内容，主要是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作概略性的叙述，还称不上有系统有深度的研究。除此之外，大多是一些评论性文章，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千家驹、李紫翔编著的论文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堪为其中代表。它们皆试图对乡村建设运动作出一个总体性评价，且都持批判态度，但取向不尽相同。

陈序经曾将乡村运动概括为三种模式：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孔家店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青年会式，青岛市政府的都市化式。⁸陈氏对于定县和邹平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这不是出于具体而微的实证分析，而是来自对乡村建设理论的探讨。这种“理论的探讨”却带有这样一种痕迹，即简单地以一种预设的理想方案代替另一种方案。他批评梁漱溟“既偏于复古，他不得不反对西化”。⁹然而这种评价也可用于其自身。他既偏于西化，乃不得不反对复古。事实上，他对乡村建设指明的道路正是“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¹⁰的西化道路。也因为这种倾向，不为时人重视的青岛市政府的乡村建设却甚得陈氏青睐。他提到，“青岛市政府曾经试办了好几年，而且有了显著的成绩。我愿意一般之谈乡村建设的人们，对于我这种的主张，以及青岛的过去的经验，能加以特别的注意。”¹¹但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青岛的模式比其他实验更有前途。《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虽为论文集，但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基本都持一种批判态度。该书的分析路径与陈书极为相似，虽有关于定县和邹平的专论，但仍是从事论上进行总体性的探讨，比如对于“定县主义”、“邹平乡村建设哲学”的分析。尽管孙晓村将乡村建设运动分为七种类型¹²，但在他们看来，

6 许莹涟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 1935 年。

7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 1 页。

8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 1946 年版，第 27 页。

9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 1946 年版，第 17 页。

10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 1946 年版，第 91 页。

11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 1946 年版，第 97 页。

12 第一种类型从近代的教育观点出发，用最实际的社会教育方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并企图拿这一套实验的结果介绍推广到全国。这一类型的代表是晏阳初领导下的定县实验区。第二种类型也可说是从教育入手，不过这教育是以发扬固有的礼教精华，培养内在的能力为内容，而将自治的工作与教育打成一片，将自治的机构溶合在教育的机构里，其代表是梁漱溟领导下的邹平实验区。第三种类型是纯粹从自卫出发，彭禹廷领导下的镇平最足以代表。第四种类型是从改革县政入手，江宁，兰溪两个实验县属于这一类。第五种类型是专门从事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广，在这一类型中，华洋义赈会是最标准的一个。第六种类型是以实验并推广优

所有类型都可归类于“一部分知识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对于将来的革命怀疑，对于目前的现状不满之一种烦闷下”，广泛开展的一种改良主义运动。¹³乡村建设运动者及其理论家只是“国内外金融资本及政府当局所进行的事业上一一种点缀品”。¹⁴而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之势力”。¹⁵“实行国有土地的彻底改革，才是我国土地问题的一条大路。”¹⁶但是，这一结论同样缺乏充足有力的论证。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中国乡村建设批判》，都提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局限固然是有的，但据此对乡村建设运动持否定态度就值得商榷了。实际上，二者对于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实践都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分析，更多的是以各自理想中的美好方案来取代实践中的乡村建设运动。它们的背后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只不过一为西化派，一为马列派而已。

（二）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的乡村建设研究

1950年代后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大陆地区对乡村建设运动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直至8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逐步恢复和重建，中国近代乡村史、乡村建设研究才逐渐被学界重新纳入研究的视野。由于当时正处于研究的早期，因此抢救与整理宝贵的历史文献是当时的首要任务。

1984年邹平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征集梁漱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1991年邹平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后又相继出版了《梁漱溟全集》、《晏阳初全集》等。其中不乏梁漱溟和晏阳初两先生等关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都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除了整理出版了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领袖的全集、文选和民国时期有关乡村建设的期刊杂志整理、出版外，各地还召开了一些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涌现出了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

良的农产品种为主要目的，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乡村工作都属于这一类。第七种是一般的农村改进区，既无雄厚的行政力量的资助，也无特殊的乡村建设哲学的信念。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燕京大学的农村改进工作可为其代表。参见孙晓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32-34页。

13 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序言第2页。

14 张志敏：《从整个民族经济上观察现在的乡村建设》，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65页。

15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149页。

16 李紫翔：《按劳分配的土地村公有之批判》，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241页。

东大学社会学系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专著至少有10余本，而论文更是达至数百篇，其中尤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区为考察重点。

进入九十年代后，民国乡村史的研究逐渐进入一个丰收的繁荣时期，而“乡村建设”研究作为民国乡村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以整个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为考察对象，有的以某一个实验区为考察范围，有的研究则专门考察乡村建设举措的某一个支项，比如关于乡村自治、农业改良、合作运动、乡村教育等。不过，这些研究的主旨大多仍局限在复原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本来面目，注重厘清乡村建设运动本身的一些问题，诸如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过程、效果及其领导人的思想理论等进行考察，基本上仍是就乡村建设而言乡村建设。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徐有礼等的《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赖建诚的《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版）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亦产生了一批有较深见解和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其中以虞和平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徐秀丽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刘重来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郑大华的《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孙继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述论》（《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邱志强的《对梁漱溟乡村合作运动的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徐秀丽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

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谭肇毅的《评三十年代新桂系的乡村建设》(《学术论坛》1998年第1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等为主要代表。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亦纷纷涉猎该领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学者艾恺的《最后的儒家》一书。他把梁漱溟思想放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考察,把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放入一种中国乡村及整个民族传统与现代化两难抉择的状况中进行分析。他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的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此外,一批青年学者亦表现出对该领域的兴趣,涌现出了一批以乡村建设为题目的优秀博士论文。其中南开大学博士宋星云の《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一文对乡村建设思想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路径做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现代化的基石,知识下乡是乡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乡村工业化是乡村现代化的构成要素。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崔效辉的博士论文《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也从现代化视角入手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理论,是有关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之一,反映了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实,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现代化具体方案,为我们反思历史和描绘未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

(三) 近年来中国大陆乡村建设研究的新取向

1、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with 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建设运动

9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逐渐吸收融合了一些国外的优秀史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方法指引下,开始对民国史进行重新审视。于是在此影响下,作为民国乡村史重要研究内容的乡村建设研究亦得到史学界的重新检视。其中罗荣渠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现代化新论》,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吴雁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虞和平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等论著都对乡村建设运动中所体现的现代化思想加以了关注。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马勇、宋恩荣等人则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评论。此外,陈晓华、王安平、刘重来等人则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社会学的调查手法,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研究的新视角方面,学界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批用新眼光、新思路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的新成果。例如,目前由南京大学朱庆葆教授所主持的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乡村建设和研究》在这方面就做了有益的尝试。课题组目前已完成前期初稿的创作工作,预计明年下半年将正式出版问世。该课题之所以选择以长三角地区这一以往被学界所忽略的乡村建设为对象,意在通过与华北(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比较审视,增进了学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目的、主导力量和推进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不但填补了学界在该区域乡村建设的空白,且从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国内对于原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其中课题组突出强调了国家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国民政府对其统治中心地带的江宁县所开展的乡村治理变革,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纵横脉络中,并从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控制和发展的两个层面对江宁县的乡村建设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关于对乡村建设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为解决民族苦难与危机的一种思考与实践,其出发点是为了在革命之外,寻求通过一种和缓的乡村改革的方式来使得中国实现独立富强。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而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基本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而言,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某些措施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场运动总的来说却是失败的。这种意见又以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专著。郑大华认为,尽管参加运动的团体复杂,实验模式也呈多样性,但是总体来看,这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虽然乡建工作者“深入民间”的行为,对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却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其复兴农村经济的努力却归于失败。郑大华的结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¹⁷。但这种失败的判断,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们将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与政权移易互相挂钩。在大多数研究者那里,中共取得了国家政权,其农民运动当然是成功的,而国民政府连政权都已覆灭,其乡村建设自然也是失败的。同样,其他实验区的活动在帮助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农民运动面前也是相形见绌。很多研究者都怀有这样的内心假定,这是一种从结果出发的研究,或许在某

17 从结论的角度来看,何建华等关于近二十年乡村建设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尽管考察的视角不同,大多数研究的结论却相当的一致。比如徐有礼关于宛西的研究,他认为,宛西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一部分地方势力从自救的立场出发进行的一场农村改良运动,但因为彭禹廷等人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严重脱节,从而难以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参见徐有礼:《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第216页。)孙继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述论》一文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来源于他对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社会结构及中国文化基础的分析。其实质是要依靠旧政权的支持,以和平改良的方式,造就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一个济世良方,即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终于逃脱不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窠臼,因而最终也未能解决好农民问题。刘一民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模式述论》也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社会在民族自救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改良思潮,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和其它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其乡村建设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如虞和平等人的研究虽努力挖掘乡村建设的意义,但仍然是在失败中进行挖掘。以上只是略举几例,类似结论性语言尚有很多。

些研究者那里,结论在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定论。这样一种隐含了结论的前提假定反映到研究上,自然就形成了“民国乡村建设有限论”的同一种声音,尽管很多人也做出了某种肯定,但细加考察就可发现,那只是出于偏狭的二分法而作出的一种象征性肯定,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

2、乡村建设运动与近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随着当代农村改革事业的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习惯于把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代的乡村改革进行比较,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如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颜俊儒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启示录—以民国乡建两大模式为例》、王金霞的《定县模式—北碚模式两种不同乡村建设模式的取舍》等文章都是对民国乡村建设模式的研究中探寻对当代乡村建设的有益启示,试图通过解放前国民党和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以乡村自治或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各自的现实基础和运行机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农村治理的模式做出某种理论概括,并且从历史和现实的启示中提出解决农村民主治理某些一般性难题的思路。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则选择了另外一个视角,从传统的乡村社会政治特征、辛亥革命后乡村政治、新中国以及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进行对比,突出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体制在整个乡村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这种纵向的比较研究无疑把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看作一个延续的现代化过程。

(四) 当前乡村建设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

总的看来,虽然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很多研究成果没有脱离过去“革命史”研究范式,注重对乡村建设思想的改良性质加以批判,忽视了乡村建设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对乡村现代化所作的贡献。在拓展现代化视野、把乡村建设思想放在更广阔的现代化背景中考察方面,似乎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其次,对乡村建设运动中典型代表性人物“点”的研究很多,但没有把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面”进行研究,点、面结合不够,没能把乡村建设思想看成是延续的、有发展过程的一个连贯体来研究,因而也没有从整体上理清乡村建设思想整体发展的脉络,更对不同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差异性关注不够。把乡村建设运动等同于乡村教育运动,从文化、教育视角入手研究乡村建设思想者居多,甚至互相重复,却忽视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政治和乡村经济改造方面的努力和思考。所以,从现代化角度立论研究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以点带面,以典型人物带动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想的整体研究,分析其对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现代化中政治

民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进步所做的各种思考和努力,是非常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

再次,当前学界多注意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实践,认为知识分子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但却忽略了军阀、地方实力派或政府官员及民间其他团体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笔者认为,就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而言,其来源思想之广、运作手段之多、各种不同的乡村建设的成效,远非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两个民间团体所从事的以文化教育及改良手工业为主要手段的“乡村建设运动”所可以涵盖。就更广义上的“乡村建设运动”范畴而言,阎锡山在山西所从事的“村治建设”、民国初年张謇所推进的淮南盐垦与农村移民、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所从事的农业调查与改良、国民政府在“江宁自治实验县”为代表所进行的农村改造,乃至后来中共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土地革命等都是对如何进行“乡村建设”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即便在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亦有取向、手段及背景的差异。因此,正是基于国家、政党、民间团体及个人对“乡村建设”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民国时期所形成了基于不同目的的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模式,并最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如果能加强上述类型与模式的比较研究,则可以更全面的掌握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全貌,丰富学界对该领域的认识。但显然目前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乡村建设运动显然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性极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也更为突出。就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比照审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显然西方以工业带动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乡村建设模式更具有成功的价值,代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绝不是仅靠农村自我反省与改造所能完成的。乡村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历史也证明了仅仅依靠农村自身的改造是无法跳出小农经济循环发展的历史怪圈。因此,若仅就乡村自身而言乡村建设,必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主义误区,只有采用城乡接合,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才是解决乡村问题和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因为如此,2008年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才因势利导的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农村政策。所以,在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应努力破除就乡村言乡村的局限性,采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来重新审视民国建设运动。如果能将城乡结合起来研究,用城市化的视角来看待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笔者相信无疑会开辟出该领域新的舞台。这不但对于中国乡村史、乡村建设史有较为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亦定会有所裨益。

当然,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研究理论与视角的进一步多元化,笔者也相信学界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成果,成为中国近代乡村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期望史学界同仁们共同努力!